

91岁的伊淑英是“沂蒙六姐妹”中最后一个离世的。除公方莲老人过世早我没见过以外,我与张玉梅、伊廷珍、杨桂英、冀贞兰、伊淑英这五位都很熟悉,在她们家里吃过煎饼,喝过地瓜粥,听她们唱过抗战曲、解放歌。

上世纪90年代,我长时间从事新闻工作,得以与她们有较多打交道的机会。尽管她们的名字和事迹早在1947年就已荣登《鲁中大众》,被根据地的军民所知晓,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沂蒙地区在挖掘和弘扬沂蒙精神时,她们才再度被发现,进入更为广大的公众视野。

1995年麦收时节,我陪同《解放日报》记者第五同再度来到烟庄,找到的第一个“六姐妹”是伊廷珍,我们坐在她的院子里乐融融地闲聊。我知道她们五姐妹刚从天安门国旗班回来,便问起她们此行的见闻和感受,伊廷珍老人说:“真好!真好!”

在当时健在的五位老人中,杨桂英和伊淑英性格相对沉稳,最开朗最活泼的当数伊廷珍。她在“真好真好”之后的一句话,让我和第五同都犯了思量,因为她说:“每次到吃饭时间,就让我们到一个小房子里先站一下,然后再出来。”这话让我和第五同很是推敲了一番。五位老人淹没于平凡的生活

中已长达40多年,这次进京也是她们第一次见到矿泉水。我忽然想到,伊廷珍老人所说,应是电梯。楼层面貌相差无几,她们只以为到一个小房子里站站再出来,实际空间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我和记者同时会心地笑了,笑过之后,我心下却难掩心酸。战争年代,她们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,如今日子好了,她们却还未真正享受到。但她们已经很知足,仿佛重新跟组织接上了关系一样,焕发出



五位“沂蒙六姐妹”在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50周年时的合影(资料片)

【忆海拾珠】

永远的六姐妹

□张世勤

了全新的热情,马上还要到上海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去慰问。

后来,市场经济全面发展,当地企业从中发现了商机,注册了“六姐妹”品牌煎饼,聘请五位老人做了名誉厂长,并为她们印制了名片。她们一把名片发给我,我说:“祝贺你们!”仍然是伊廷珍笑得最灿烂,就跟她是真正的厂长一样。伊淑英老人说:“只要对大伙有利的事,我们就干。”

最后一次去烟庄,是跟一家单位的宣传干事薛慧中女士



一起,我们两人傍在伊淑英老人左右,在烟庄的巷子里边走边谈,随行的摄影记者留下了这幅画面(见小图)。我与五位老人都有合影,与伊廷珍老人在她家院子里长聊的照片,曾发在当年《农村大世界》杂志上。那天,我们在街口的碾盘上坐下来,又一次谈起过往。伊淑英老人拉起裤管,让我们看她当年搓麻绳搓伤了的腿。当年,抽调山东部队去东北,新四军军部北移临沂,带过来的多是南方兵,大多是穿着草鞋来的,在山路上一磨就破碎了,好多战士的脚被山石扎破。一个个赤脚打仗的战士,让“六姐妹”看着心疼,她们便动员全村妇女为战士赶制鞋子。伊淑英老人说:“一只鞋底就要纳120行,

一行要过30多针,每针都要经过锥眼、穿线、走线、拉紧几道工序。姐妹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做,胳膊和大腿都磨起了泡,出了血,手指也变了形。”后来有个粗略统计,仅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,烟庄村的乡亲们为部队烙煎饼7.5万公斤,筹集军马草料1.5万公斤,洗军衣8500多件,做军鞋500多双。那么,谁敢说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七十四师的覆灭,没有她们的功劳呢!谁敢说整个华东战局的扭转和解放战争的反攻,没有她们的贡献呢!

据冀贞兰老人回忆,“沂蒙六姐妹”这一称谓,是当年陈毅元帅亲自给起的。冀贞兰老人说:“他骑一匹马过来,打着绑腿,不知道他是谁,看上去很和蔼的一个人。匆匆忙忙的,快要打仗了。他问完我们的情况后,笑着说我给你们起个名字吧,叫大嫂呢你们还有没结婚的呢,叫大姐吧还有结了婚的,干脆就叫你们沂蒙六姐妹吧!”直到很多年后,冀贞兰老人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里看到陈毅的照片时,觉得面熟,身旁的人告诉她,那就是陈毅。

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“沂蒙六姐妹”,一直没有停止过拥军脚步,她们做的鞋垫,一双双被送到边防哨所。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,2008年汶川地震,几位老人在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纷纷捐款捐物。她们发动儿媳、孙女昼夜加工“千层底”,寄给抗震救灾一线的子弟兵。

听说,伊淑英老人在去世前反复叮嘱:“入党的时候就说了,要听党的话。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,那么多人牺牲,为了革命他们付出了一切,得让年轻人记住这些过去的事。”

“沂蒙六姐妹”是永远的姐妹,也是永恒的母亲。

编者按:糖纸,烟盒,拨浪鼓;弹弓,瓦屋,琉璃弹儿…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它们可是一代人童年生活中的最爱。作者王淼见证了那个逝去年代的许多老游戏、老玩具、老物件,乃至老屋、老宅、老建筑,也写下了儿时的风物、民俗。虽然多是童年的微末小事,但作者力图写出时代背后沉甸甸的东西,多一些言而无尽的意味。“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,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……”今天起,本版刊发“旧时光”专栏,请读者朋友一起回味光阴的故事。

【旧时光】

老宅

□王淼

我家有一座老宅,在古城的张牌坊街上。老宅不大,有三间带走廊的堂屋,一间小巧的门楼过道。小小的院内遍植着石榴树和枣树——石榴树结出的是白色的冰糖籽,粒大汁丰,甘甜可口;枣树结出的是脆灵枣,皮薄肉厚,又甜又脆。听奶奶讲,这座老宅其实并不是我家的祖产,它的格局不大,解放前应该属于一家小地主所有,土改后分给了爷爷奶奶,连同室内摆设的条几、八仙桌子和太师椅等,应该都是那次城市贫民分享胜利果实的收获,以至后来爸爸入党,外调人员前来家访,看到这座颇带些老门旧家“范儿”的老宅,马上认定爸爸的家庭成分过高。最后颇费一番周折,爸爸的入党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。

我的幼年是在老屋中度过的,那时最常听到的,是奶奶讲述的那个千篇一律的故事:“东山磨磨牙,西山磨磨牙,回来吃你姊妹俩。”即便已经听了无数遍,爱听的我还是立马不罢。爷爷为人忠厚老实,前半辈子一直靠做小生意养家,收入微薄,勉强糊口。解放后公私合营,爷爷不仅分到房产,他本人也进了副食品公司。所以,爷爷的确是真心拥护新政府,感谢那个新时代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“文革”伊始,每到吃饭的时候,我们家的一个日常功课是,大家围坐在饭桌前,听候爷爷的口令,全体起立,合唱《东方红》。唱《东方红》时的爷爷显得很肃穆,也很虔诚,他态度谦卑,垂手恭立,唱到动情处,眼中甚至还常常闪现着泪花。我和姐姐、妹妹虽然均为这种庄严的阵势感到有一点可怕,但内心深处却又未免觉得有些好笑——想笑,却又不敢笑,只是埋下头来匆匆吃饭,然后,跑到外面尽情撒欢去也。

当然,老宅留给我更多的,还是那些温馨、快乐的画面。老宅不大,能利用的地方基本都利用上了。记忆最深的是位于堂屋左手的那个小花园,它以树枝、秫秸编织而成的篱笆作围墙,从外面看,里面花木繁盛,枝叶掩映,可谓密不透风,但走进进去却是别有洞天,沿着屋墙边的小径走到尽头,居然还有一个逼仄的厨房。夏天,荫凉的花园自然不失是一个消暑的好去处,尤其是玩“捉迷藏”,随便找个角落蹲下,总能让那些邻居家的孩子找上半天。冬天,我们会躲进春意融融的厨房,争着抢着帮奶奶拉风箱,不仅身上暖和了,有时还会得到奶奶的奖赏。当然,下雨或者落雪的时候,我们大多会转移到封闭的门楼过道里玩耍,相比之下,这里的空间更为阔大一些,也更适合玩诸如“木头人”之类的户外游戏。

古城里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老宅和老屋,它们青砖灰瓦,曲径幽窗,房顶上长满了各种杂草,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岁月年轮。我一直觉得,所有的老宅和老屋其实都有自己的生命,它们都是通灵性的,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。虽然其中未必会发生聊斋故事,却总会有一些有趣、好玩的细节,令人怀想,让人难忘。所谓“红尘世界”,所谓“人间烟火”,其实也都是与这些老宅和老屋的存在密不可分的。

但是,很遗憾,今天的人们似乎再不珍惜老宅和老屋了——老屋说拆就拆,老树说砍就砍。他们不愿再倾听老宅对历史的诉说,不愿再凝视老屋对过往的重现。一切让人心安安静的东西,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如果说每一代人的情感都要有所附着,失去了老宅和老屋,我不知道,我们这代人的情感又要附着何处呢?

【老照片】

1940年初,父亲所在的八路军三支队经过邹平县北部的焦桥镇,与日伪军发生激战,父亲腿部受了伤,无法跟随部队继续行动,就被秘密安排到附近村一户老年夫妇家养伤。

父亲住下来,两位老人给理了发,找来旧粗布衣裳换上黄军装,又把随身带的长枪埋到墙脚下。白天父亲躲到地瓜窖里,晚上才接到屋里。大爷托先生开了药,每天晚上为父亲清洗伤口,大娘还先后杀了两只鸡为他补身体。父亲的腿伤好得很快,20多天就能下地了。很快,父亲打听到部队已到博兴和广饶一带活动。想要追上部队,这100多里路上多是敌占区,没有日伪的“良民证”怎么办?还得想法带上那杆长枪。父亲找两位老人商量,还是大爷想出了办法,先是筹借些钱,托亲戚到邹平县城买通伪六团的人,办了张“良民证”。大爷又借来一辆骡车,车上装满黄麦稷,把枪藏在里面,有人查问就说帮亲戚盖房子去。那天早晨,就要上路了,大娘把一袋干粮搭在父亲肩上,千叮咛万嘱咐。父亲想起这么多天来,两位老人不怕受到牵连,对他体贴照料,他紧紧拉着大娘的手,动情地说:“大娘,我的母亲早年就过世了,你们二老对我这个普通战士像对待亲人一样,如果不嫌弃,我就认你做干娘。”

解放后,父亲曾回到这片热土寻找两位恩重如山的老人,却没有打听到消息。1959年夏天,父亲收到二叔的家信,“干娘”终于找到了,可是干娘的老伴已经去世了。那年夏天,父亲把干娘接到沈阳工作的部队住了有半年多,还到医院为她治好了头晕病。这张照片就是老人去沈阳时留下的,也是她一生仅有的一张照片。

干娘

□姜毅



在台儿庄东部与江苏邳州交界处,有条陶沟河,发源于兰陵县马庄村北部山区,全长31公里,满河芦苇玉立,葱茏繁茂。在这原生态的湿地美景中,有座古老的石桥格外引人注目。这桥原先淹埋在水底淤泥中,2015年被清理出水面,露出桥面之上的累累车痕。

《台儿庄区志》记载:“陶沟桥位于台儿庄东3公里的陶沟河上,乾隆年间建。桥长108米,宽4.5米,两端均筑50米引桥。桥为全料石结构,中间两墩各雕一龙,呈戏水之态。抗战时期,一龙尾被日机炸掉。今桥已残毁3处。”

当年修桥的石碑也从河底打捞出来,立在陶沟桥西端,碑名为“重修陶沟桥记”,

【行走齐鲁】

风雨陶沟桥

□郑学富

为清朝光绪三年立,碑文依稀可见,大意为,清嘉庆初年,谭成洛因见两岸来往行人不便,决心修桥,解囊捐资万余串,动工建桥,可是尚未完成谭成洛病故。两个儿子继承父志,终于把桥建成。由于常年风雨剥蚀,车马践踏,桥面损坏较重,其孙谭秀东又自捐资千余串,加以修葺。谭家父子建造陶沟桥的义举,受到嘉庆皇帝的恩赐和嘉封,御赐骑尉、监生和捐职千总户职务。当地乡绅也自发捐资竖起“功德碑”以示纪念。

1938年春,台儿庄战役爆发,中国军队的第二集团军和第六十军先后在此布防,日军飞机将陶沟桥炸毁成三段,一龙尾也被炸掉。后来,桥东头

的史庄有个大户人家,用木桩当桥墩,用秫秸当桥梁,秫秸上面囤土,简易地把炸毁的三段桥修复起来,桥上只能走行人,不能过车辆。时间久了,秫秸腐烂,当地的人们渐渐地就用土把桥孔给填平了,剩下的石桥也只有没被炸毁的西头这一段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陶沟河河床淤泥越积越高,古老的石桥也被淤泥淹埋。在回族老人马福同锲而不舍的呼吁下,1985年、2008年苏鲁两省合力建造了第二、三座新桥。被从淤泥中挖掘出来的陶沟河石桥,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雨侵蚀,已没有了往日的雄伟壮观,留下的只有河中桥段的原型,东西两头的引桥已不复存在。